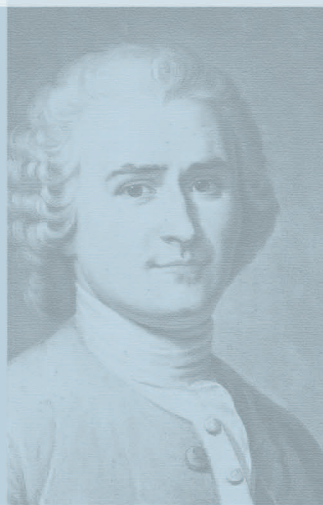




卢梭说的 东方传承

何力群 / 著

LUSUO XUESHUO DE
DONGFANG CHUANCHE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卢梭学说的东方传承

何力群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梭学说的东方传承 / 何力群著.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06-14698-5

I. ①卢… II. ①何… III. ①中江兆民(1847-1901)
—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D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2817号

卢梭学说的东方传承

著 者:何力群

责任编辑:郭雪飞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1.5 字 数:17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4698-5

版 次: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中江兆民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理论家、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家。他的众多著述，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明治时代的思想界及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日本国民，而且对后来日本政治现代化的导航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逐渐被重视，近代的立宪政体的必要性也被日本国民所逐渐认同，进而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发生了以争取自由民主权利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即自由民权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普及了民主权利的思想，而中江兆民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者的角色。

政治思想是中江兆民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兆民在明治维新后的具体影响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四点：

1. 中江兆民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舆论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的一大理论贡献是，介绍与高扬了卢梭的有关“自由”的思想。由他作为主要撰稿人的《东洋自由新闻》和由他创办的《政理丛谈》杂志，都在舆论阵地上极大地支持了民权运动的发展。

2. 中江兆民通过传播法国卢梭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民选议院成立与否的问题上，扮演着批判专制政府的重要角色。

3. 中江兆民阐述的“君民共治”的理念，是近代的民主观念，为明治时期的政治体制指出了明确的政体模式。清晰地揭示出，政权是全体国民的公有物，而非专制政府的私有物。

4. 中江兆民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德治主义”的首倡者。兆民在说明自由的真谛的同时，把中国儒家倡导的“道德”与西方的政治理念

相融和，描绘出国家与人民之间“自我约束”的道理及重要性。而且兆民强调，只有伸张“德义”，才是明治维新大业的基石。

明治初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早期启蒙思想家们鞭挞封建制度，启发日本国民确立人格的尊严并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激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意识，并从中产生出超越明治政府的有限改良范围的政治要求。但对于如何建立一个与专制的封建社会相对应的理想的民主社会，他们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蓝图。明治十年以后，自由民权运动的勃兴使日本的思想界，从对单纯的人人平等论的宣扬，不断向以人民主权问题、宪法问题和开设国会问题为中心迈进。中江兆民的理论研究和文论正是着力于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除了通过传播卢梭的思想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之外，中江兆民作为一位能构造体系的理论型思想家，他的主要思想活动都是围绕着探索政治形态问题和具体的日本近代政体方案展开的。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政体模式在日本获得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相适应的新形式之前，兆民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使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能够顺利地植入日本社会，寻求传统和西方政治思想的共同基础，并在新的基础上对传统进行改造，使西方思想得以适应日本的风土。他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在东方传统和西方文明之间寻求统一性，并在其统一性上建构他的思想体系。在兆民看来，东方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自由民权思想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他调动儒学传统思想资源，力图从中找出一种能够解释和融通近代自由平等理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价值。他以儒家学说为形式，吸纳并阐发卢梭思想的《民约译解》就是这样一部以汉学之文载卢梭思想之道的杰出译著，由此在当时开启了一股“卢梭风潮”。同时，他又用卢梭的自由民权思想，对儒家“理义”观作出新的注解，提出“民权至理也，自由平等大义也”，从而使儒家的理义思想获得创造性的转化。

纵观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可以发现他的东方型自由主义、民权论及外政论等思想，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中独树一帜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是以日本立宪国家、民族国家建构为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从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日本立宪国家、民族国家

建构，民权论与国权论的相互冲撞对近代日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明治时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自由民权的兴衰和确立立宪政治中的一些基本现象和规律。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1
二、有关中江兆民政治思想研究的概述	4
三、本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方法	6
 第一章 中江兆民自由民权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7
第一节 明治初期的政治局势	8
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的开端	18
第三节 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	22
 第二章 中江兆民的自由民权论	38
第一节 投身自由民权运动以前的中江兆民	39
第二节 《策论》与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	45
第三节 《东洋自由新闻》与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	50
 第三章 中江兆民后半生的政治活动与思想	71
第一节 从被流放到明治宪法颁布	72
第二节 中江兆民与第一议会	80
第三节 从“实业家的时代”到晚年的中江兆民	87
 第四章 中江兆民与《民约译解》	101
第一节 中江兆民与卢梭的《民约论》	102
第二节 《民约译解》研究	105

第五章 中江兆民的代表作——《三醉人经纶问答》	128
第一节 《三醉人经纶问答》的主要内容	128
第二节 《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写作特色与背景	134
第三节 三醉人所代表的人物及思想	142
终 章 中江兆民的个性特点	163
结 语	169
参考文献	171

绪论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明治维新之后，在维新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文明开化政策之下，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纷纷涌入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界，涌现出许多宣传西方文明的社会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即所谓的“洋学者”。由于这些“洋学者”的活跃，当时的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时，在政治思想领域，在日本有重大影响作用的社会政治理论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明治初期曾被政府所推崇的英式社会改良主义理论。民权派的右派、改良派的“改进党”就把这种理论奉为他们的指导思想。他们鼓吹大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相妥协，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有机体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思想来指导日本的资产阶级改革，使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福泽谕吉。他由于受到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更着重倡导实用功利之道，主张克己利人。

第二种是后来日本政府所极力提倡的以德国康德、黑格尔唯心论为基础，再掺入佛教和日本神道宗教思想要素而重新构造的日本式唯心主义理论。它主张在保持封建王权和专制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局部的由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良，发展军国主义，使日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其早期代表是井上哲次郎和井上圆了等人。

第三种是英法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理论。在哲学上以法国18世纪唯物论和英国培根、洛克的经验论为根据，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则以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理论为根据，主张进步的民主主义。中江兆民和植木枝盛

等人秉承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倡导自由民权运动。他们的译著《民约译解》、《三醉人经纶问答》、《民权自由论》、《天赋人权辩》等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中江兆民，既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又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充分的了解；他学贯中西，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自由论，被时人誉为“东洋的卢梭”。他以《东洋自由新闻》为舆论阵地，向社会广泛宣传了和过去以边沁、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英国议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性质完全不同的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和民权思想，并且具体地把它应用到自由民权运动中去。

众所周知，中江兆民（以下简称兆民）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理论家、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家。兆民的一生处于近代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经过明治维新、到走向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剧变期。他的众多著述，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明治时代的思想界及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日本国民，而且对后来日本政治现代化的导航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江兆民

明治维新以后，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逐渐被重视，近代的立宪政体的必要性也被日本国民所逐渐认同，进而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以争取自由民主权利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即自由民权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普及了民主权利的思想，而兆民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者的角色。

在当时的藩阀专制时代，要争取民权，就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理论作为支撑，所以翻译介绍欧美国家先进的民主政治书籍是时势所趋。兆民以一位先觉者的姿态，洞悉时势，以汉译的形式、“民约译解”为题，翻译并诠释了卢梭的巨著《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并从1882年（明治十五年）3月起以连载的方式将《民约译解》刊登在他主办的《政理丛谈》杂志上，由此在当时开启了一股“卢梭风潮”。在日本自由民权史上，兆民的这部译作的地位被比拟为基督教的《圣经》，尤其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是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基础。由他所阐发的《社会契约论》是对卢梭思想原则的应用和具体化，强调了人民具有反抗权和革命权的思想，为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传入我国较晚，直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的时候才传入我国，即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的《民约通义》，而这第一个译本正是通过兆民的日译本转译的。这也正是兆民不被称为日本的卢梭而是被誉为“东洋的卢梭”的缘故。兆民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极力鼓吹自由平等的思想及“人民主权国家”的观念，系统地向日本民众介绍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对自由民权思想的宣传发挥了先锋作用，并使这些思想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支柱。自由民权运动中产生的日本最早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政党——自由党之所以能够快速壮大并与藩阀独裁政府相抗争，开展“开设国会请愿”，要求“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等一系列运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卢梭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

纵观兆民的政治思想，可以发现兆民的东方型自由主义、民权论及外政论等思想，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中独树一帜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兆民的政治思想是以日本立宪国家、民族国家建构为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从兆民的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日本立宪国家、民族国家建构，民权论与国权论的相互冲撞对近代日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明治时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自由民权的兴衰和确立立宪政治中的一些基本现象和规律。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①分析和论述中江兆民政治思想的内容、形成、发展及其政治思想理念的独特性。②通过分析和论述以卢梭主义为中心的兆民政治思想的内容、形成、发展的过程来反映出自由民权思想对近代日本政治史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日本近代自由民权运动的源流及兴衰的历史轨迹。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①有关日本明治时期政治思想尤其是其代表人物的相关研究在我国还不是很多，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日本政治思想史乃至中江兆民研究的某些不足，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②研究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有助于从自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分析近代日本所走过的历史进程，进而把握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治思想的形成、时代精神对于近代日本的影响。这对观察

和认识当今日本政治思想和一些政治现象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有关中江兆民政治思想研究的概述

迄今为止,国内有关中江兆民思想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他的哲学论,而且多数论文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如:《论“中江主义”在日本哲学史上的地位》(华国学、杨孝臣,《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中江兆民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李宗耀,《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从〈续一年有半〉看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形神思想》(陈增辉,《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中江兆民与中国古代哲学》(徐水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等。这些论文重点关注和评价的焦点在于,兆民是“近代日本哲学史上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认为他“之所以不同于明六社的启蒙哲学家,也不同于一般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关于兆民的政治思想,进入21世纪以来,从下列几篇论文中可以看到从不同角度对兆民的民权思想进行的概述性介绍。如:《“欧化”与日本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龙岩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法国启蒙民权思想东传与变异》(《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19世纪末期日本摄取西方政治制度时的主体性选择》(《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此外,《明治前期日本近代化政治思想研究》(许晓光,四川大学,发表时间2007-04-10)和《日本明治时期民权与国权的冲突及其归宿》(邢雪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时间2009-05-01)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均从各自的主题出发,对兆民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民权论有所论及。

真正对于兆民的自由主义及民权论有比较深入研究的应该说是王家骅(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和刘岳兵(浙江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两位学者。王家骅的论文《中江兆民的自由民权思想和儒学》(《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通过分析儒学思想与兆民的自由民权思想之间

的关系（如：指出“‘理义’这一概念以及对其道德性的理解，并非兆民的创举，而是来源于《孟子》”），以及由此关联如何形成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东方”特色，强调了儒家思想在形成“兆民式的”自由民权思想中所发挥的功能。文中指出：“兆民往往以儒学家的概念、观念与思维方式理解与诠释卢梭的思想，例如赋予其人民主权思想以道德主义色彩，尤为重视‘道德的自由’并予以《孟子》‘存养’论式的解释等。因而中江兆民的思想又应说是有别于卢梭思想的东方型民主主义。而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发生巨大影响力的，并非卢梭思想的原型，恰恰是融入了儒家思想的中江兆民的东方型的民主主义。”

刘岳兵在题为《从儒家思想看中江兆民自由主义的“东洋性格”》（《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的论文中，分别从儒学的本末、体用、天人、心性、理气等相关范畴分析了兆民的“东洋式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特点，并在名为《日本近代儒学思想研究》（刘岳兵，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书中，通过对兆民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汉学（儒学）基础的考证及其思想中儒学与自由民权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同他的‘心之自由’或‘道德之自由’等概念所示，儒学与自由主义在兆民的思想中如两镜相映难分彼此”的结论。书中具体指出：①兆民的思想原点及其东洋性格应该到“土佐南学”中去寻找。②儒学的心性论是兆民的东方型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③兆民的天皇观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

唐永亮的《试析中江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和《试论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日本学刊》，2008年第11期）是在梳理兆民国际政治思想演变的基础上，以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文明观”和代表作《论外交》为切入点，分析兆民前期的国际政治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以兆民的代表作《三醉人经纶问答》、现实主义和平外交论和近邻提携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文章认为，前期兆民仅从“政理”的角度探寻日本独立发展路径，中期兆民则试图从“政理”、“政术”和“政俗”三个角度全面寻求小国日本的国际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政治思想。前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为特征，中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的特征则是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

三、本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方法

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先行研究对于认识 and 了解明治时期有代表性的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帮助,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①要深入完整地理解兆民的理论精神、政治理想和独创性,离不开对兆民的生平、日本近代历史尤其是自由民权运动史等背景资料的把握。由于先行研究以论文居多,受篇幅所限,对时代背景的交代不够详细,因而对兆民思想的分析显得较为空泛和缺乏实证。②兆民的政治思想有一个萌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截取兆民思想的某一时期、某一侧面进行论证,给人以只见麟角而不见全貌之感。对兆民早期的活动尤其是给兆民的西学打下重要基础的法国留学时代的事迹和思想分析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这恰是兆民思想源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仅从兆民的儒学基础和儒学对兆民的影响来把握兆民的政治思想就不会看到一个全面的兆民,对兆民政治思想的准确理解就会有所偏颇。因此,本研究决定在借鉴和继承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比较全面地认识和介绍兆民本人和他的政治思想。具体而言:①本研究将会更为翔实地介绍明治维新以来到20世纪初的日本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衰过程及兆民在其中发挥的影响和内在关联。因为这是兆民自由民权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必要条件。②本研究将会把兆民的政治思想活动的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对其生平的介绍,以弥补先行研究不够全面的不足。③本研究重点分析兆民的代表性译文、著作,把兆民的日文原著作为研究文本,以便更为准确地分析兆民的政治思想。与此相关,也把兆民用汉文写成的《民约译解》与卢梭的中文版原著相比较,以考证《民约译解》的诠释方法及其立场,并分析其中断的原因。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结合对近代日本的时代背景、具体历史事件、兆民的生平活动的介绍,从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衰历程中考察兆民的思想轨迹;在日本明治立宪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把握兆民的思想脉络;通过对兆民各时期有代表性的著译的解读,力图更为深刻地理解兆民的政治思想。

第一章 中江兆民自由民权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明治初期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端、展开是兆民自由民权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必要条件。兆民之所以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极力鼓吹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继而从原理上对西方的立宪制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君民共治”等政治理念都与当时日本的社会现状和政治背景分不开。本章将通过介绍明治初年发生在明治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介绍，说明由于明治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藩阀专制及有局限的维新政策所引发的农民暴动、士族问题乃至西南战争，以此呈现明治初期动荡的政治局势；进而通过这样的历史背景介绍，探究自由民权运动的起因和具体的展开过程。在民权运动的开端一节，介绍《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的提出和爱国公党的建立过程，并分析早期民权运动表现出的士族民权的局限性。即：这一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并不是普通日本国民向专制政府争取自由的运动，而是土、肥两藩在派系斗争失败后，不得势的士族以自由、平等为号召，借自由民权运动的名义，利用群众斗争的有利形势，反抗萨长藩阀独揽政权的一种表现，这与兆民所倡导的自由民权有着不同的特质。在民权运动的展开一节，介绍立志社的成立、爱国社的再兴、开设国会运动的兴起、国会期成同盟的组成过程和民权派提出的私拟宪法草案。

第一节 明治初期的政治局势

近代日本的倒幕运动，是由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运动领导者，依靠同豪农、豪商的联盟并利用了空前高涨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倒幕运动的领袖们在明治政府成立后成为新政权中的实权人物，形成所谓“藩阀”。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倒幕主力的四个藩（即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1]的藩阀手中。但围绕如何建立日本国体、军事制度等有关明治开国问题的对立，使藩阀之间出现矛盾；而另一方面，随着倒幕藩阀中的新兴资产阶级、贵族与幕府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天皇迁都到原幕府势力强大的江户，资本主义势力最强大的西南诸藩与东迁的中央政权矛盾也开始加剧，大批萨摩、长州、土佐等西南藩官员相继辞职。伴随着政府内部藩阀之间的权力争斗，最终集权于萨长藩阀的明治政府为了推进日本迅速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维新政策，诸如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改革封建等级和封禄制度，取消武士的封建特权；建立近代常备军警制度，等等。这些政策为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种改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能充分地满足参加讨幕运动的豪农、豪商和广大农民的要求。从1871年（明治四年）7月废藩置县起，到1877年（明治十年）3月西南战争结束，在大约六年的时间里，政局几乎完全处于动荡之中。

农民暴动

不完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制度，不解决土地问题，就必然会使明治政府已经进行的废除封建制度的各项改革成果付诸东流。^[2]因此，“改正地租”（地税改革）^[3]是明治政府所实施的维新政策中的一项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广大农民因为改正地租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更加贫穷化；多数佃农所处的境遇反而更加恶劣。同时，维新政府推出的一

连串的近代化政策，诸如征兵令^[4]、改用阳历、新学制^[5]等，也引起了农民的误解。从1871年（明治四年）废藩后到1874年（明治七年）间，日本各地农民以所谓“一揆”的形式展开空前规模的反政府暴动。据青木虹二的《百姓一揆总合年表》记载，1868—1872年各个年度的农民暴动次数分别为136次、141次、89次、61次、34次，其频繁程度与庆应年代不相上下。另据土屋、小野合编的《明治初年农民骚扰录》记载，1868—1877年，规模在万人以上或持续时间在一个月以上的农民起义，1868年1次，1869年5次，1870年5次，1871年2次，1872年2次，1873年8次，1874年1次，1877年1次^[6]。其中以1873年（明治六年）最为激烈。明治政府正是在这一年发布了征兵令和地税改革条例。发生暴动的地方大都在近畿以西，尤其以中国、四国、九州等地区为甚。因为这些地方由于歉收导致米价、物价高涨，人民的生活困苦到了极点。农民们在暴动中向明治政府提出了各种要求，诸如反对征兵、反对设立小学、停止发行地契、减轻年贡、降低米价、反对废止贱民制等等。1873年（明治六年）6—7月，福冈县参加暴动的人数达到三十万人，除了反对征兵之外，还要求中止学校与地契及免除三年年贡。参与暴动的人们烧毁县厅，袭击豪商、地主与高利贷主。1876年（明治九年）在中部地方和关东地方也爆发了要求减轻地税的农民暴动。政府被迫将地税由三分降低到二分五厘。农民们“以竹枪刺出来的二分五厘”歌颂他们的胜利。此外，北条县、鸟居县、名东县等地都发生了人数达几万人的大暴动。暴动往往相互诱发，呈连锁反应而不断扩大。

士族反叛

在此期间，士族问题也愈演愈烈，以至于演化成为明治初期政局动荡的最关键因素。当时，日本的士族（旧武士阶层）在幕末和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激烈分化。其中一小部分上升为新官僚，和富有的资产者的士族逐渐褪去旧武士的阶级属性，而变成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在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和巩固明治政府统治的过程中起领导作用，而士族中的绝大部分却日益贫困化并即将变为无产者。明治维新前夕，不满现状的士族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倒幕和尊王上面，但当幕府被推翻、